

出 版 说 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踏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出 版 说 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踏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目 录

陈祖芬	在英国坐火车	(1)
	大皮鞋	(3)
	依旧依旧唐人街	(6)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9)
杜 宣	伦敦一瞥	(14)
戴镛龄	重访伦敦杂记	(17)
冯骥才	雾里看伦敦	(22)
金坚范	英伦一瞥	(52)
林 海	莎翁的艺术魅力永存	(66)
	绿荫深处的“斋之角”	(76)
	司各特令人怀念	(82)
李国文	英伦风情	(88)
钮保国	日不落的“辉煌”	(116)
石 英	伦敦小广场之夜	(122)
	路灯下的曼彻斯特	(126)
王佐良	斯凯岛上的文采	(131)
	彭斯之乡的沉思	(144)
萧 乾	旅英七载	(156)
杨 翊	泰晤士，这条举世闻名的河！	(179)

袁可嘉	剑桥行	(187)
	克尔马诺克的光辉	(190)
宗 璞	看不见的光	(194)
	没有名字的墓碑	(197)
	他的心在荒原	(201)
	写故事人的故事	(208)
编后记	 李国文	(214)

陈祖芬

在英国坐火车

从伦敦的欧斯敦车站上了火车。乘务员小姐的制服是黑色带红边的围裙，白底红条的衬衫，系一个红领结，衬着一头金黄卷发，像眼睛会转动的大洋娃娃。检票员戴着镶银条的黑礼帽，很精神。我出示车票，他看过微笑着还我，又走到我的前座旁。这里坐着一个英国女学生，不，她没坐着，一开始检票她就躺下了，瘦削的身子缩在双人座椅上。检票员看着她，她坚持“睡着”。检票员的职责，是检查每一个乘客的车票。刚刚启动的火车上，乘客不可能“睡着”，不应该“睡着”。高高大大的检票员俯视着这个蜷缩着的弱小女生，我紧张起来。

我打量那银条黑帽下的表情，堂正敦厚的脸上，除了善意就是笑意。他回过身对我指着那弱小者说：“她死了。”

他笑起来，只有善行才能笑得这么温暖宜人春风荡漾。

哦，是的，她“死了”，太好了，她“死了”。死了就不用检票，不用补票，就一了百了。

她死了，检票员就没有失职。

检票员笑笑向前走去。我还浸在他的笑容里，体味这份善。一个女学生，如果不是很拮据，不会逃票。如果让她补票，她会脸红，会非常难为情，会伤害这个小小个子里的未必小小的自尊心。如此温厚地保护她的自尊，她日后还能不尊重检票员的工作？

乘客们大都在看书报，也有铺了一桌纸埋头工作的，好像车厢是个移动办公室。不，车厢更像个图书馆，安静得完全毋需在阅览室墙上贴条：不要大声喧哗。如果不是伸长耳朵去听，都不会觉得有人在轻轻说话。

有人走动买回食品。英国火车上都有比 16 开杂志宽一些的牛皮纸拎袋，可以装进热汉堡包、小瓶酒和酒杯等。上车前买食品一样方便。每个车站都有几家快餐店，有“Take away”的供应，就是让人买了拿走的。我们在英国跑了好几个城市，中间来回坐火车。有时去某城一天即返回：懒得把行李箱拖来拖去。好在车站有成排成排分格的存物箱。我们在约克市的车站把八大件行李塞进两格，锁上门，只需两镑钱。如果不放心，要交给车站专人看管，那么一件收一镑。其快当，其省事省力，叫我老想去存行李，感受一种高效的快感。

火车驶到爱丁堡附近，突然停下，说是火车头出故障了，得下来换一辆火车。走下站台得绕出点路才到另一列车。想到上一次坐火车，也不知哪儿出过一次故障。如今英国的水、电都私有化，都赚钱。铁路是国家补贴的，票价低，赔钱。政府也想铁路私有化，不过很多百姓反对，怕裁员，怕涨票价。

老了的铁路怎么办？在又一辆火车上坐定，英国乘客开玩笑说，刚才马（火车）不叫了，因为没东西给它吃，没劲

了。

乘客倒是因祸得福。播音员说，刚才很对不起，现在车上热饮料冷饮料一律免费供应。大家笑着自取饮料。乘务员一个个端着移动电话走来，让乘客们打电话告诉亲朋，原定20：40到站，改为21：22到。乘客有话没话的故意打电话给亲朋玩。乘客笑，乘务员也笑，协同作案似的。一位女性笑道，打个电话给梅杰吧。又有人说，打个电话到北京吧。乘客大笑，乘务员也大笑。原先图书馆般安静的车厢，这回变成喜剧剧场。好像每个人的笑细胞都给刺激起来了，一车欢笑。

火车误点是多么快乐的事。

又想起约克车站的播音员，总是用喜歌剧的调门播站名，用歌唱来工作。我每次听见这播音总要笑，笑了又笑。回到北京还是笑着想起那歌唱：纽卡——斯尔，格拉斯——哥——。

出门坐火车，原来也可以是一种享乐。

大皮鞋

从伦敦带回一只大皮鞋。不是一双，是一只。很大，不知可以住进几只脚？不是伸进，是住进。高大的鞋帮，一侧有六格窗户，另一侧不仅有窗，而且一扭开关，整侧鞋帮便成一扇打开的大门。门里靠墙有低矮的书柜，墙上贴着儿童画，还挂着一块大黑板，上边有粉笔写的字： $2+2=4$ ， $1+$

3=4。鞋帮上端是可爱的红瓦屋顶和伸出的二层楼的小窗户。笨头笨脑的鞋头上，还有一扇可以拉下的小门。门一拉下，就是一个台阶，顺着台阶几步就可以径直走进大皮鞋里。

红屋顶下有一只大大的蓝色圆钟，提醒住在大皮鞋里的人可别睡过了头。谁住在里边呢？小兔、小松鼠、小鸟，还有好多小动物。我儿时有一本大约半尺见方的画着彩图的书：《大皮鞋》，封面上就画着完全一样的一只大鞋。我常常看着小兔、小鸟们快乐地在大皮鞋里出出进进。后来，后来我的大皮鞋哪儿去了？随着我在上海的童年时代一起消逝了。

然而这只大皮鞋突然出现在伦敦街头上。就这么一只，只有一只。是从我童年的那本书里跑出来，跑到这里来等我的。世上万物，都属于最钟情于它的人。我对从我的童年飞回的大皮鞋，哇哇叫着，像原始人那样，只会用最本能的方式表达我的惊喜。

在伦敦找回了我的童年，继而又走回了我的故乡上海。伦敦很多用长方石块砌的墙，太像上海的外滩。自然外滩很多建筑本来就是英国人建造的。伦敦更多低矮温馨的商店，尤其像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北京路。一位英国女友对我说，她6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对北京气候不适应。从北京一到上海，她就哭了，因为上海的湿润、上海的建筑太像伦敦，上海叫她直想家。

伦敦叫我直想上海。那天我在帕斯特利亚饭店吃早餐，边吃边看菜单。我的职业毛病就是什么都想看。英式早餐，8.75磅一个人。煎鸡蛋，1.5磅一只，咖啡，1.25磅一份，面包卷——哎，有人喊我，用上海家乡音。我抬头一看，觉得好像熟悉可又不认得。他说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请来学院三人。上海戏剧学院是我母校，这三位带有浓

重乡音的上海人中，果然有教我4年的老师。

一段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又像刚出炉的热面包卷，新鲜地摆在我面前。

我十多岁时读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大学三年级第一次写剧本，就是改编《大卫·科波菲尔》。以二十来岁的无知和自信，我为自己的剧本写了个前言，说剧中布景、服装乃至墙上的一只钉子，我都有考据，都不能有改动。到大学毕业时，我最喜欢的作家多了一个：莎士比亚。在诞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土，在伦敦的又恰如上海的蒙蒙细雨中，我一无陌生感。

当然伦敦有很多上海没有的东西。夜晚的牛津街，店铺关门了，橱窗还亮着。有一个雪亮的大橱窗里，从顶部吊下一排十多个着草裙的女人半身。就是说，顶部是十多条飞扬的草裙，草裙下是十多双大腿。这些人体仿制品跟着电子音乐的节拍成排地甩着或是花样地舞着，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音乐指挥的喷泉见多了，音乐指挥的大腿舞没有见过。而且跳得使我想起百老汇，想起好莱坞，也想起上海在经济规律的指挥下，跳出变幻无穷的快步舞，跳向世界经济的轨道。前后不过数年。想想也如童话。

牛津街附近的小路上，一个店铺把货架延伸到门外。货架显眼处挂着一件文化衫，上边用英文写着：“我丈夫去过英国了，就给我带回这件衣服。”或许，什么时候上海就会出一种文化衫，上边用英文写着：“我常常去上海买衣服。”

这世界上的人，都住在一只大皮鞋里才好，就像可爱的小兔、小松鼠们，就像很多童话的结尾：后来，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依旧依旧唐人街

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英国小伙子在啃中文书。我说，你喜欢中文？ he 说是。我说怎么喜欢上的？他说因为喜欢中国的功夫片，还喜欢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呢？没了。

我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很有趣。他觉得功夫片和张艺谋很有趣。

摆在寻常英国人面前的中国，首先不是北京，不是大陆，而是唐人街，是唐人街上的中国餐馆，是比中国还中国的餐馆。挂着国画、年画，或者不是国画不是年画又是国画又是年画的什么画，画着舞龙、弹筝、对弈、飞天。比画更多的是联，譬如龙飞凤舞、莺歌燕语，财源广进，万事如意。比联更多的是广东话。

在餐馆坐下，一看就是原籍广东的侍应生趋前殷勤地问要什么“踹”。“踹”？菜？是不是广东语经过英语的熏染再转成国语，就会把菜字带上英伦的语感杂烩成“踹”？我用脚使劲踹餐桌下的地板，希望能踹掉正在我心里发酵发痒发作眼看就要“喷薄而出”的大笑。我说我要一碗叉烧炒面。他说好，一碗“插销”炒面。我赶紧用双手撑住额头挡住笑脸，不是鬼脸。任何事物过了度都会走向反面。譬如笑过了头笑脸就变成憋得通红流着眼泪的鬼脸。他端上面站一旁，一再说慢慢“死”。我可以慢慢吃，要说死，不如快死速死干净利落嘎巴脆。

不是国语不是粤语也不是英语，是唐人街上的唐语。很有些英国人听多了唐语，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语。有一个正在英国讲课的北京人。英国人问他怎么说话与别的中国人不一样？怎么不开餐馆？

中国人在英国，难道都是皮肤黄、身子瘦，给人端“端”端“插销”炒面的？

晚上我走到唐人街的僻静处，看到路边有块牌子写着俱乐部。顺着阶梯走到地下，却只见几张大桌子，每张桌子围着一堆人在干吗。在用姜片什么的赌。姜片怎么能赌？或许那不是姜片。是什么我也没看清。如果一个人被过强过炽的灯光照着，还能看清自身以外的东西么？我一进去，第一张桌子周围的人全都看着我，盯着我，好像他们的体内突然掉进了什么异物那么惊觉，每一张面孔上射出两道白炽灯光。我在“追光”的照射下往里走，第二张桌子，第三张桌子，都变成一圈圈的聚光灯。在刺人的灯光的交织下，我如同被百十把剑架起来然后又把我叉了出去。当然我是自己退出去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退出去会发生什么故事。

不远处地面上又写着什么俱乐部。这一个俱乐部也许不一样？我顺阶梯走到地下，推开门，便觉得被人施了法术定在门框上不能动了。这时的聚光灯更强。此时立即撤出，用句广告语说，是明智的选择。

回到街上，看到墙上贴着一大张纸，写着大大的谋杀二字。讲某人被杀身亡，事件发生在下午8时，在几号地窖内。事后有人看见杀手持刀走出，望协助提供线索，一定给予保密。

我好像走进了外国电影中的华人黑社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的外国电影把中国人拍成那样。中国人实在应该更多地

走出去，带着文化，带着科技，带着产品，带着效益，带着风度，带着美丽。

我走进伦敦一家书店，找不到一本大陆的书，只有在大陆也畅销的从琼瑶到梁凤仪的港台书。当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不少中文书。我想查阅有多少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书，电脑立即显示出 40 多个书目。

我想，我们先得找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显示出实力了，人家不会不、不能不关注我们。在千变万变的世界里，依旧依旧的唐人街与今日大陆相距太远。我希望在英国少几位弯腰迎客的小餐馆老板，多一些走上大学讲台的中国教授，多一些西装笔挺走向谈判桌旁的中国商人。

当然，闯世界难。从唐人街走到莱斯特广场，看到一群同胞青年，摆了不少画像架，画一张 10 英镑，但鲜有人坐在那儿让画。他们自己说话解闷儿。说的全是我的家乡上海话。你们是上海人！我走过去。他们说侬也是上海人，佢城隍庙去过哦？我说这里哪有城隍庙？有，他们说，唐人街。我笑，是有一点像。又问我外滩走过哦？我说哪有外滩？他们说伦敦的大笨钟不等于上海外滩的大时鸣钟么。他们说他们到了伦敦老觉得还在上海。

越是说伦敦像上海，越是显得伦敦毕竟不是上海，所以需要把伦敦描绘成上海，用上海话充塞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在伦敦营造上海。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一位在伦敦当编辑的北京人请我吃饭。他挑了一家富人常去的意大利餐馆。坐定，他说他今天很想和我聊聊，因为今天这个日子于他是不会忘记的。1969 年的今天，他从北京去北大荒插队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现在只要国内来人，他总要带他们去看马克思墓，老去

老去。

我是晚饭前才认识他的。他喜欢见国内去的人，老见老见。他和北京就近了一点，近了一点。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第一天住进伦敦的帕斯特利亚饭店，发现水箱不出水。打电话到服务台，请人来看一下。挂上电话，听见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位西装领带挺括的巴基斯坦先生。他说你找我？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找你。他说刚才你打电话找我了。我说没有呀，哦，天，是来修水箱的？可是整个穿着派头好像这就要去听歌剧。而且我刚放下电话他就出现了，镜头怎么“剪接”得这么快，好像电影蒙太奇，把中间的过程省略了。可中间的程序是省不掉的：接电话的人转告他，他再来到我的房门外，除非他就是接电话的人？

我脑子里刚刚开始推理小说，他已经查看完水箱，说没毛病，我一试，真的没坏，是我刚才使的劲儿过小。我很不好意思。喊他又把他挡在门外，最后又证明水箱没故障，是我出了什么故障。

这位挺括先生挺括地走了，去参加时装模特大奖赛？

当晚一觉醒来，是凌晨5点。我算了算伦敦与北京的时差，又想此时打电话给丈夫可以半价。可是，先拨个什么号码才能拨到北京？我没法用我的一点点英语向总机问清楚这件事。如果见了人，可以用眼睛交流，用手势比划，总归多

一些辅助手段。我下楼到总台，怎么又是他？挺括先生。我说我想打个电话到北京，不知怎么才能拨通。他告诉我拨多少号码，说上自己房间打就是了，我说这是我私人的电话，我得自己付钱，不该记在住宿费里。他说他不能收钱。早上8点另一个人来了才收钱。我说8点我就离开饭店了。他说那你7点下来一次。

这段对话于我是很困难的。60年代上学时学过的英语，经不住这30年时间长河的冲刷，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痕迹，如同“古迹”可供考证，证明曾经学过英语而已。如果身边有翻译，我决计是说不上来的。可这凌晨5点，饭店前厅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一个完全不会中文，一个等于不会英文。我想我一定是给逼成了一个“快译通”（好像有一种电子翻译机叫快译通），我自己都想不到都不明白我怎么能把这些意思讲清楚让对方听懂的。自我得意之后，又想真正应该得意的是挺括先生。他怎么就能终于听明白我自己都不明白的英语呢。也许，正是他的非听明白不可的精神，使我从30年前的“古迹”里拾回了英语。

后来发现，挺括先生有时在餐厅服务。我在英国跑6个城市，回到伦敦都住这个6层楼的饭店。房间很小，小到放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张沙发、一个电视机外，只能再放下一个我了。有两个人就觉得局促。不过盥洗室不小，事实上住这儿什么也不缺，简朴而实惠，而且上哪儿都方便：肖像馆、国家画廊、唐宁街、牛津街。我住帕斯特利亚饭店，员工们好像每次都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旋转木马似地在餐厅、总台等转来转去。我想，私人企业一切都得简而精之，用不着号召提高效益，自然会时时刻刻算计着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效益。

英国保守党在1979年的竞选中，说更多的国有化使国家更加贫困。1982年，英工业大臣强调对盈利的国有化工业公司实行私有化。譬如先出售部分股份逐步非国有化，鼓励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处于同等竞争的地位。1982年4月开始，允许私营公司利用新的电信网与英国电信公司竞争。电信业需要大量投资，如果不搞私有化，英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我走进英国电信管理办公室，简称为OFTEL。这个办公室可以从消费者那儿直接得到信息，保护消费。每年公布电信公司的各项数字，使电信服务公开化。1984年拨不通的电话占2.5%，现在减少到0.4%。1980年公用电话只有60%能工作，现在99%都是完好的。

原先新成立的公司很难与英国电信公司竞争，OFTEL鼓励竞争，对英国电信公司做了限制，譬如不能提供大哥大，不能承担电缆业务。现在还有30家公司希望得到OFTEL的经营电信的许可证。伦敦城中心的水银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企事业单位的电讯，竞争的结果，各公司亮出了服务新招。英国电信公司在圣诞节前3个月内实行星期天优惠服务，就是在星期天打长途不管打到哪儿，都按本市电话计价。从1984年至今，电话用户的费用平均下降1.5%。

走进英国电信公司，一位姑娘正在打电话：你好，汤姆先生，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你家的电话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声音圆润而甜蜜，像一串甜葡萄，不像是查询，倒像在关切亲人的起居。

当今天世界上有2200万人手握大哥大的时候，当我们迎接21世纪同时也是迎接无线通信时代的时候，当很多人意识到在未来世纪里电信工业的效益很可能超过汽车工业的时候，电信业的独家经营终将成为过去。

告别 OFTEL 又去英国煤气公司，他们是 5 年前才开始私有化的。向我们介绍情况的三位先生开门见山，滔滔讲来。过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们都坐着而他们都站着。对不起，你们快请坐。于是想到英国最大的保险业组织劳埃德的先生们向我们介绍情况，也都是站着，煤气公司这三位先生长着优雅的银发。这里没有不懂行的小青年，也没有好像什么都懂又什么都好像不懂的领导。他们都没有专职接待人员，所以一讲业务简明而清晰而直截了当。我想起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话：“有钱的单身汉，总是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小说开始得这样简练而务实，实在是一种现代精神。

煤气公司一年 360 天提供 24 小时紧急服务。用户打电话来，30 秒钟要给予回答。用户来信，5 天之内要回答。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服务不到，赔偿 10 英镑。公司有 120 辆紧急修理车。我看那车，整个儿是一个小车间，层层叠叠摆满各种零件、工具、煤气表、管子，车顶上还有一个梯子。用户煤气有故障，公司必须当天派人赶到。用户漏气，一小时内必须赶到。用户打来的电话连同地址都当场输入电脑，一切有案可查。打开一个电脑，随便按出一个用户姓名，他的名字下写着一行行几年几月几日作过什么修理的纪录，活像一张煤气灶的病历卡。

我从 8 点到 11 点在煤气公司这三小时，计算机显示公司已经接了 427 个用户电话，公司平均每天为用户做 700 件事，包括安装煤气灶。公司 1987 年私有化后裁员，但服务人员不裁。效益高了，有能力在海外投资了，企业遍布 40 多个国家。

当晚我从帕斯特利亚饭店去一家娱乐场。一个售货员小姐从柜台后熟悉地向我笑，笑着就走出了柜台向我走来。我

在伦敦是第一次去娱乐场，怎么会有熟人呢？她是谁？她，哦天，她是帕斯特利亚饭店的餐厅服务员，每天早晨给我送桔汁煎鸡蛋的。挺括先生只是偶尔出现在餐厅，而她每天早晨必在，哪怕我6点多就要吃早餐，就要离开饭店，她夜里还在娱乐场打工，已经22：30了，她还得干到几点呢？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苍白。

生存竞争本是人类前进的动力。私人企业必须节约开支，增加效益。个人必须不节约精力的开支来增加效益。道理又简单又明了。如同那个著名小说的著名开头：“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